

新书馆

乐观审视货币社会：被塑造的金钱世界——评《金钱的社会意义：私房钱、工资、救济金等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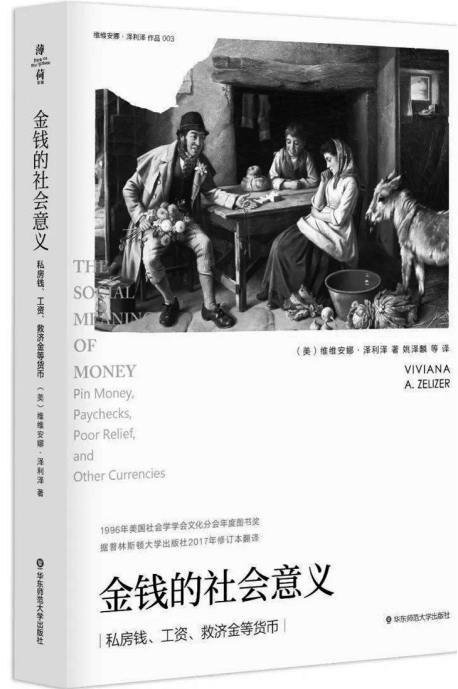
维维安娜·泽利泽

■ 崔应令

对资本主导的现代世界而言,金钱在其中扮演了破除一切壁垒,将社会均质化的角色。“万物皆有价”使得金钱不仅贯穿了经济领域,也跨入道德和社会关系各领域,成为唯一的密码,金钱帝国就此到来。均质化的金钱对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面对金钱势不可挡的全方位介入,个人和社会是否还有回击改变金钱的可能?对此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一百多年前即以文章和著作予以了悲观回答。而美国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在《金钱的社会意义:私房钱、工资、救济金等货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一书中对齐美尔等的悲观予以了质疑批判,对同样的问题予以了乐观性回答。

对金钱社会的肯定和质疑

对金钱社会的悲观看法在众多思想家的著述中都曾出现。比如,齐美尔看到了金钱社会带来的负面性:金钱将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导致社会的平均化、量化、客观化和产生包容性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社会平等价值在此逐渐实现,正是在此过程中,人的价值被物化,甚至忘却其他价值的存在,人开始产生对生命意义的失落和虚无感。货币从手段变成目的,成为现代社会的宗教。金钱带来的自由



成为没有实在之物的自由,空虚和变化无常是其特点,自我的扩展恰恰演变成“自我的萎缩”,因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无法栖居在桥上”。

此后的学者如吉登斯视金钱为“符号标志”,是社会关系与特定时间、地点分离的关键范例,以及哈贝马斯认为金钱就是经济系统对日常生活世界殖民的中介,系统性地削弱了“依赖社会整合的行动领域”。

在维维安娜·泽利泽看来,对金钱社会负面性的揭示和批判是有意义的。然而,这些论述忽略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对金钱的形塑和重

塑。在作者看来,金钱在文化上并不是中立的,在社会上也不是匿名性的。这使得金钱和社会以及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的。金钱虽然确实会削弱价值意义和社会联结,将其变为金钱数字,但同时,“价值和社会关系也会通过赋予金钱意义和社会特征而使其变形”。这使得金钱恰恰不具有单一、均质的性质,而是具有明显的社会分化特征。人们为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指定不同的货币,并对金钱的“误用”回以愤怒、震惊或嘲弄。比如一张大额纸币买小报就会引起愤怒。在特定情形下,金钱可以是完全异常而不可交换的,且文化和社会结构对金钱的流动常常设下边界和限制。

金钱的社会标记

社会是如何标记金钱的?作者分别对家庭内部的金钱、作为礼物的金钱和慈善货币进行考察,揭示金钱是如何被社会关系和文化重新塑造的过程。

家庭内部金钱的标记深受性别和阶级深刻的影响,即家庭经济含义、用途和分配都打上了性别与阶级的烙印。一方面,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方,妻子对金钱的分配和丈夫的是不同的。当然就作者研究的时期(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来说,对女性的轻视在家庭内外都有显示。另一方面,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家庭在对待妻子的钱财等方面形成了阶级区别,金钱在不同阶级家庭之间不是等价物。

作为礼物的金钱将在社会层面具有自主性和中立性质的金钱变得富有情感和个性化。其方法之一是确立礼金的专属性质;方法之二是人们将亲密的、深情的社会关系同其他社会交换区分开;方法之三是限制受赠者的花钱方式,比如对孩子的圣诞礼金可能会指定为

其教育专项资金而不能用做其他。人们通过这些方法创造了不同形式的金钱,并区分不同意义的社会关系,那些认为货币礼物会耗尽社会生活的意义,让社会关系干涸、消灭礼物交换的看法是错误的。

慈善领域对金钱的态度也随社会变化而经历了反复。在一定时期,人们坚持严格的实物救济,否定现金救济的积极意义,在另外的时期,社会强调现金救济对被救济者自由意志和个体的尊重。在对现金救济的限制和监管上,慈善机构也多有要求。在很长时间,慈善救济者还强调对穷人花钱的技术进行“科学培训”。而围绕慈善救济,受救济者和工作人员、穷人和官方,慈善专家和保险代理人等之间形成了争议,进一步揭示出现金在救济上的意义是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的,而非相反。

多元化货币及并不能左右社会的金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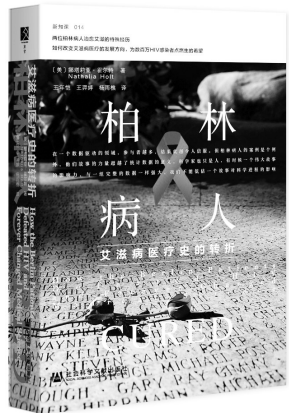
在作者看来,金钱的社会分化是普遍存在的,这使得对金钱的标记种类繁多。无论是赚取方式,还是使用、类型或名称,金钱都无所不在地受到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系统的塑造或重塑,是社会和文化决定了金钱的意义而非相反。这是对金钱社会前景的乐观看法。

作者说“本书试图阐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非常脆弱的社会关系,其活跃的、创造性的力量事实上很难被压制”。也就是说,金钱只是附着于社会的。就如礼物现金“并没有腐蚀、抑制或削弱人们的社会交往。相反,新的礼物货币被创造出来,以匹配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即金钱的社会性是根本的,是社会确立了金钱的意义。这一看法如此乐观,似乎无论金钱如何改变生活的本来面貌,人们总有办法重新反控制。就如同慈善救济给穷人设置各种限制,后者总是可以想办法变通一样。

在作者看来,齐美尔一百多年前对金钱社会的悲观看法完全没有必要,金钱是如此多元,对它的标记是如此社会化而充满区分,且这一标记的范围还在扩大,过程还在持续,我们只需要乐观看待金钱的发展,而无须多虑其后果。这一对金钱社会乐观积极的看法,或许可以部分安抚金钱称霸天下时代受控于金钱的焦虑和紧张。不过,这是否能取代并解决金钱雄霸天下的弊病和问题,答案或许还藏在一百年前先辈们的忧心里。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柏林病人:艾滋病医疗史的转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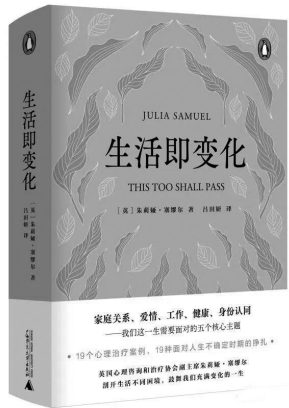


[美]娜塔莉亚·霍尔特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昔日令人闻风丧胆的艾滋病,今日已转变为可控制的慢性病,是什么让艾滋病医疗发生重大转折?艾滋病医疗又如何影响整个医疗发展的方向与未来?作者霍尔特身为HIV研究人员,曾在实验过程中差点感染HIV,在经历可能感染的恐惧与服药的折磨后,决心将艾滋治疗发展的来龙去脉公之于世。她亲自探访两位被治愈的柏林病人及他们的医生,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在书中逐渐呈现艾滋患者所遭受的心理生理双重折磨、众多专家奋力找出有效疗法的重重战斗、医疗产业的限制与政治角力、HIV的致病机制等。在大众依然恐惧艾滋病、患者人数节节上升的此刻,本书将帮助读者深入认识艾滋病以及这段医学发展史。

《生活即变化》



[英]朱莉娅·塞缪尔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

生活充满变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让人不安、恐惧。在自己的诊室,朱莉娅·塞缪尔接待了很多来访者,帮助他们做出调整,接受改变的痛苦,逐渐获得心理资源。塞缪尔从家庭、爱情、工作、健康、身份认同五个角度(涵盖人生每一阶段会遭遇的典型危机和丧失),以不同案例讲述人们面对危机变化时的真切故事,以及帮助来访者处理困惑、洞察自身经历、解决问题、获得勇气、寻找充满希望的新开始的过程。在最后一个章节,作者提供了可使用的心理工具和技巧。

《先行:华为与深圳》



金心异 陈倩 李宁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2021年9月版

一家企业和一个城市的关系,从来没有像华为与深圳的关系这样特殊。本书梳理了深圳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全球重要城市的过程,聚焦华为与深圳的风风雨雨四十年,从全球视角探讨了一个产业和一个城市是否可以踔出一条新的路径,使二者互相成就,对于高新产业园区的从业者来说,一个城市的增量,是否可以借鉴华为与深圳的关系?全书通过尘封的往事、缜密的逻辑和翔实的数据梳理了华为与深圳的关系史,结合当前华为的处境,展望了一家企业和一座城市的未来。

(言浅 整理)

品鉴坊

《侠义三千年》：承袭中国式侠义的精神遗产

阅读提示

《侠义三千年》一书缘于作者吴向京在北大关于“侠义文化的演变”的讲座,它跳出了文学的视野,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去探求侠义文化的演变及其意义。本文作者认为,该书重估了侠义的历史语境与传承价值,探讨了侠义的、有条件的侠,如何转化为普适的、“无所待”的侠,并试图将侠义变为精神遗产,实现人格内化与心灵建设。

■ 俞耕耘

我们常被武侠一词误导,仿佛不会武功,没有绝技,都够不到行侠的门槛。《侠义三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一书重估了侠义的历史语境与传承价值。它的意义在于探讨了狭义的、有条件的侠,如何转化为普适的、“无所待”的侠;侠的行动性,以及如何侠的精神性。从而,吴向京、暴昱东两位作者沟通了古代人与当代人的精神纽带。我想这是当代性反思的重要向度,即如何将侠义变为精神遗产,实现人格内化与心灵建设。书中以勇敢、舍得、信诚、仁义、独特,概括侠的特质。它们都指向自在自为的精神特性——这是独立精神个体,自我决定的生命意志,是主体性力量的极度张扬。侠的本质是精神力量,理想化人格。

作者对侠客的阐释,颇有见地。侠之所以为“客”,在于侠士为义所驱动,而非为“主”所蒙养、驱使。主客关系,是独立自主的去留关系,不搞人身依附,不是雇佣关系。侠客们是“赴义”,是非曲直,公平正义乃是行动前提。这也说明侠客、刺客、杀手与爪牙的区别。先秦两汉之际,侠客里有大量是刺客,或为报知遇之恩,如荆轲、专诸、高渐离等壮士;或为行正义事,如曹沫、墨子以一己之力捍卫正义,改变战格局的大勇。而刺客则未必是侠客,大有沦为替主子报复私仇的“工具人”。对侠而言,伦理力量和道德判断是首位的,他们不因小恩而害大义。

中国侠义的特质

可贵的是,全书以比较视野,阐述中国侠义的特质。中国侠客不像骑士迷恋贵族荣誉、个人名声,也不在乎来自上层的“册封”。堂·吉珂德在自封受命后,才能行侠的套路,肯定会遇到中国侠客耻笑。赵氏孤儿的故事,为何能打动文豪伏尔泰?因为程婴忍辱负重,为大义不惜个人名节,这是西方缺乏的精神力量。程婴选择比公孙舍生更痛苦,更艰难的保全之路,先后牺牲了名声与生命。西方骑士更爱惜个人羽毛,更追求形式感,有外在的功利性(赢得荣誉)。内敛不标榜,施恩不图报,是中国侠义的高光之处。它说明中国侠客不重因果,不讲“对价”,主动放弃实用和功利主义的行动逻辑。在我看来,这正是无我亦无所待的超越性。

唐代以来,侠客在正史中再难寻觅,开始在诗歌与传奇中流传。唐代诗人将侠的精神托寓于诗酒人生,浪漫理想中,这与言志和抒情传统天然契合。李白的仙,离不开几分剑气侠胆。“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边塞诗人则从侠客那里承袭豪迈尚勇,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战死沙场,实质是侠的价值最大化与集群化。“而其他的诗人,基本都是以侠自许,可能感于世事艰难,也可能是寄托情怀,他们是怀着侠客理想的文人,借侠客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本身并不去江湖上游侠、闯荡。”

唐传奇,则为侠客走进小说题材提供了奠



基。虚构的、抒情的侠客形象出现了,聂隐娘、虬髯客、红线,打破以往笔记小说文人名士、神仙志怪的故事类型垄断。侠客故事也开始远离庙堂与政治,加上了神秘想象。而归隐江湖,虚构人间的创作倾向,也成了从还珠楼主到金庸以来新武侠小说的总体面貌。

文人与侠的内在关联

全书发现了一个有趣视角,那就是文人、士大夫、儒生们与侠的内在关联。作者是从侠的伦理价值、精神内核来考察,绝非流于“武侠”的表象。换言之,武不是侠的特征,只是为践义而采取的手段之一。纵观后世有侠心侠胆的,往往出于士阶层,他们有寄托自比之心、追慕之意。这在秦汉之际,就能找到端倪和肇因。那时“侠客的身份也是以游侠为主,但都是属于有产阶级。他出去行侠仗义是‘游’,而多数都是家里有大量财富的人。”

如果联系庄子对逍遥的诠释,游的本质实

为自由。侠的基石亦是自由,而精神不是凭空冒出的,我们如今嘴上常挂的“财富自由”也是重要因素。侠,在本质上已成为理想化人格,正如儒家对“君子”的心理期待。如果我们反推,侠客身上必有君子的底色,仁义与信义。只不过,他们的行事原则与手段,又超出了温柔敦厚与中庸之道。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于儒家传统里,挖掘了两者结合与平衡的可能。有侠义精神的名臣大儒,往往可发挥更大影响,更好实现家国治理的图景。

“侠之儒者是以外另一种面貌呈现的。说到剑胆琴心,不得不说三个著名的人物——苏轼、辛弃疾、陆游。”豪放词人有侠士的文化基因,用词的意象世界暗示出侠的精神世界。左牵黄,右擎苍,卷平冈的围猎;会挽雕弓如满月的大侠形象,可能只有郭靖如此,苏轼未必如此。但这丝毫不影响苏轼的代拟与角色扮演。

在政治上,苏轼一生被贬,终不遂志,在旧党和新党间两头得罪,饱受排挤。这反而说明苏轼磊落耿直,总是从政见本身判断,从国家利益出发,不会屈从讨好特定势力,从不落井下石去报私怨。“从个人角度他都是最不应该为新法说话的人。但是苏轼坚持认为新法中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为新法说句公道话,那是义之所在。”从这一角度看,陆游、辛弃疾与苏轼同属一种人格类型,那就是认准国家义理,不妥协退隐,绝不会从主战转向求和。侠义精神需要这种“一根筋”,不摇摆,不骑墙。

《侠义三千年》是一部中国侠义的观念史,也是一种关于侠的类型学。作者对于侠的述略,既有高下大小的层级性,也有分门别类的厘定性。这是一套纵向与横向交互并举的论述系统。同时,上半部关于中式侠义特质的辨析,与下半部对于中国侠义的简史线索,又是史论结合。从总体性看,全书勾勒出中国侠义的动态演绎过程——那就是四个字“脱实向虚”,不断从史实人物变为虚构形象,不断内化延展。在我看来,这标志着由史入文的趋向,史传传统里的侠客事迹,逐步演化为普适性侠义精神,成为文化积淀。